

建国后归国侨生安置工作探析

上官小红

【摘要】侨生作为国内外联系的纽带，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建国后，出于种种原因，大批侨生归国，中国在归国、选籍、出境方面也做出了争取侨生的努力，并相应开展安置工作，华侨补习学校便是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安置工作秉持“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则，并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相结合，其目的不在于将侨生特殊化，而是弱化他们的特殊性，使其适应、认可并融入中国社会。侨生安置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侨生自身特点和国内客观存在的困难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安置工作。

【关键词】归国侨生；侨生安置；华侨补习学校

【中图分类号】D6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7)01-0131-14

本文所讨论的“归国华侨学生”，系指在海外出生，并于新中国成立后归国的华侨青年学生。二战后，海外华侨子弟在居住地升学受挫，家境优裕的华侨纷纷将子女送回中国求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激发了一些热血青年对中国的向往，甚至不顾父母反对而悄然回国；或征得家人同意，只身回国求学；部分侨生随父母回国。妥善安置侨生，并对之加以适当照顾，成为侨务工作的重要内容。归国侨生长期生活在中国，与海外亲人联络不绝，对中国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他们与海外的往来家信配合着其他侨务工作，向海外传达着新中国的形象。归国侨生对于当时中国所力求的“扩大华侨爱国统一战线，支援解放台湾”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是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

目前学术界对建国后的侨生研究聚焦于当代华文教育，而对于建国后 20 年

【作者简介】上官小红，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世界史专业 2014 级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务院侨办重大项目“世界华侨华人史”（GQBW2015007）；福建省社科一般项目“20 世纪 20-60 年代福建的归侨及其安置”（FJ2015TWTB003）

内的侨生安置研究只在归侨安置研究中略有提及^①，对侨生回国情况、归侨安置原则等问题，往往点到即止。相对于普通归侨安置研究，侨生安置是薄弱环节，缺乏针对性的研究。侨生安置遍及全国各地，安置原则大体相同，布局较为均衡，安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普遍存在。本文以福建省为重点，在多次赴福州、泉州、龙岩、厦门、漳州等地调研的基础上，查阅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安溪档案馆的档案资料，立足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分析侨生归国、华侨补习学校的设立、侨生安置原则等问题，以期较为全面地探讨归国侨生安置工作的历史。

一 争取侨生：归国、选籍与出境

新中国接收侨生并积极引导、协助他们升学、就业，这不但是归侨安置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出于与台湾争夺侨生的需要。据1955年广东省统计，陆续回国的华侨学生与青年约有7万人（华侨学生约5万人）^②。1956—1957年，福建省安置了1000—2000名侨生就学^③，至1958年，有些侨生尚未安置。50年代末、60年代初侨生人数出现了大幅上涨的情况，1962年以后侨生人数又急剧减少，从这一时期福建省的安置统计情况（表1），可窥见其趋势。

表1 1960年以后福建省归侨安置情况统计表

年度	总人数	侨居地					安置情况			
		印尼	缅甸	新马	菲律宾	其他	农场	工矿等	回乡	就学
1960	26 341	25 560	17	425	72	267	14 644	2888	2870	5939
1961	5475	5420	1	30	14	10	3745	223	975	532
1962	327	308	—	16	—	3	38	3	262	24

① 归侨安置研究中的侨生研究，参见庄国土《中国政府对归侨、侨眷政策的演变》，《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第3期；张小欣《“九三〇”事件后中国对印尼归难侨救济安置工作论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童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安置印尼归侨政策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上官小红《归侨与侨乡社会：福建安溪归侨安置研究（1949—1960）》，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华侨教育研究中也略有涉及，参见庄国土《论台湾当局的华侨教育政策》，《台湾研究》1994年第2期；杨柳平《1949—1978年海峡两岸华侨教育比较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② 《复有关华南华侨学生与青年工作》，1955年3月12日，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209-1-27-154-156。

③ 《当前我省侨务政策的几个问题》，1958年2月22日，安溪档案馆，档案号：0048-002-0041-0024。

(续上表)

年度	总人数	侨居地					安置情况			
		印尼	缅甸	新马	菲律宾	其他	农场	工矿等	回乡	就学
1963	440	—	82	182	104	72	14	31	382	13
1964	694	22	169	247	159	97	35	44	594	21
1965	1365	95	453	474	268	75	257	32	1034	42
合计	34 642	31 405	722	1374	617	524	18 733	3221	6117	6571

注：就学学生数量是对侨校的统计，其他学校学生数量未统计。

资料来源 《1960年后新归侨安置情况逐年统计表》，1966年3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2-1752-0004。

从表1可知，仅在1960年，福建安置到侨校升学的侨生人数达到5939人，1961年也还有532人，而此后几年大幅缩减。表中只计入侨校学生数量，因此数字并不准确。据1962年的《关于侨生工作的调查报告》显示，自1960年以来，回到福建省的归侨学生共有13 000余人。至1962年，在福建省“各高等学校学习的侨生有2288人，普通中学约有3700人，集美华侨补习学校有1900人。此外还有6000余人分布在各中等技术学校，或跟随家长安置在华侨农场和各地侨乡小学继续学习”^①。此后，侨生的数量总体上大幅减少，表1统计虽不精确，仍可见基本趋势。1966年，福建接待的325名归侨中，安置在学校的仅6人^②。可见侨生人数已经极少。1960年左右是侨生归国的高峰期，这是东南亚国家（尤其印尼）排华浪潮所致；也可能“由于中国大陆复办暨南大学及创办华侨大学，相当一部分海外侨生赴祖国大陆深造”^③，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出现个别年份侨生人数激增的情况。其中，后者本不应造成随后侨生人数的减少，但因中国国内社会运动造成的消极影响，抵消了华侨学校的积极效果；印尼归侨人数占了这一时期总归侨人数的90%以上，可知前者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排华时期的侨生数量激增，造成侨校资源紧张，一些学校进行了合并，以节约教学资源。1958年暨大与华侨补习学校合并^④，1959年潮安华侨子女补习学

① 《关于侨生工作的调查报告》，1962年，福建省档案馆，0178-017-0048-0052。

② 《1966年度接待安置新归侨情况统计表》，1967年1月4日，福建省档案馆，0148-002-1752-0006。

③ 张亚群《海外侨生赴台湾升学述评》，《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3期。

④ 《建议召开专门会议解决有关暨大与华侨补校合并的一些问题》，1958年7月25日，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214-1-137-12。

校更改为华侨初级中学^①。1960年,因短期内在校师生从2000多人突增至4000多人,校舍紧张,集美补习学校侨属子女补校停办^②。

据1962年2月统计,广东省“省属14间高校中,有华侨学生1404人,港澳学生298人。市属51间中学,有华侨学生3371人,港澳学生401人。广州华侨补习学校有华侨学生827人,华侨小学有华侨学生447人。”^③可见,侨生以中学生为多,特别是以在中学补习以待考入大学的人数居多。

侨生回国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与1960年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国家持积极鼓励的态度,吸引侨生与归侨,并予以妥善安置。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取消双重国籍政策的落实及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侨生的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与建国初期积极鼓励侨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态度相比,此时要低调得多。1958年,中侨委指出,鉴于当前国内外实际情况,特别是华侨本身的利益,华侨需要长期在国外居留,就应该参加当地的经济、文化事业,促进中国与侨居国的友好关系。在处理华侨学生回国升学问题时,对于高中尚未毕业的学生,要劝告其父兄妥善地安排他们在侨居地继续就学^④。“这不但符合实际需要(事实上绝大多数华侨学生都留在当地升学或就业,不可能回来)和华侨的长远利益,而且符合我国外交政策和侨务工作的根本方针。”^⑤其后,印尼排华造成侨生再次出现回国高潮。随着印尼排华运动逐渐平息与中国国内社会运动的开展,华侨回国人数大幅度减少,只有零星侨生回国。

侨生回国后,先于沿海口岸的华侨招待所等待安置。1954年,广州设立了归国华侨学生投考中等学校委员会,负责办理华侨学生升学问题。对于适龄侨生,相关部门根据侨生祖籍地及其在国外已完成的学业进行酌情分配,分别安置往广东、福建、云南等省。“多数侨生祖籍在广东、福建,因而都希望分派回原籍或沿海城市,不愿意分配到西南和西北去。”^⑥但分配工作仍以国家统一分配为主,安排到华侨补习学校的侨生往往祖籍各异。侨生被安排到各个学校,就广

① 《同意潮安将普埠华侨补校改为华侨中学的批复》,1959年9月1日,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314-1-142-164~164。

② 《集美文史资料》(第十辑),内部发行,2000年12月,第13页。

③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归国华侨学生、港澳学生团结教育工作的报告(二稿)》,1962年4月,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215-1-294-052-057。

④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1958年,安溪档案馆,档案号:0048-001-0021-0036。

⑤ 《传达贯彻归国侨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1958年4月19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013-0016-0013。

⑥ 廖中才《难忘的岁月——“侨生”生活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相思·友谊·故园情——台港澳及海外文史资料专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1页。

东省而言，暨南大学和各地华侨中学向海外多招华侨学生、港澳学生，这些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80%，其他大中学校每年也录取一部分华侨学生、港澳学生^①。确定学校后，侨生被安排进入相应年级学习。若是水平不及，则给予安排补习，以使之顺利升学。

取消双重国籍的政策提出后，归国侨生也面临着国籍选择问题。国家的政策是“着重激发他们做中国人的光荣感”，“鼓励和争取绝大多数具有双重国籍的人，在自愿原则下，保留中国国籍”，不在国内主动挑起选择国籍的问题，不进行“三好政策”的宣传。政府单方面认为，在国内具有双重国籍的归侨和归国华侨学生“自认不存在双重国籍问题，也不愿意做外国人”，因此不存在选籍的问题。此观点显然没有正视问题的本质。他们更多考虑的是，从现实方面，若归侨、侨生选择外国国籍，将会给侨务工作带来麻烦，“如果众多的人去选择外国国籍，在管理工作上势必造成许多困难”；而从根本上说，归国侨生选择外国国籍是对新中国的不信任，“在政治上影响不好”。因而对选籍问题上动摇的人，将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为尽可能地争取侨生，国家通过积极的引导和消极的选籍宣传来争取归国侨生选择中国国籍。与此相反，对于身在海外的侨生的家人，国家则认为，“因考虑到本身的处境及切身的利益”而选择侨居国国籍是“很自然的”，并应劝导侨生充分尊重国外亲人的自愿，不要阻挠国外亲人的选籍，“一个家庭内存在不同国籍是正常的”^②。

除了选籍方面的有意引导之外，国家还对侨生、归侨出境进行严格管理。据厦门市统计，1962年1月至11月，已出境的侨生共有343人。其中往南洋的有47人（柬埔寨11人，北越10人，印尼9人，新加坡2人，菲律宾8人，马来亚5人，泰国1人，河内1人），到港澳的有296人。这一年，已出境和正在申请出境的人数较以往任何时期都有显著增加^③。鉴于两岸关系紧张与人口外流的现实，以及归国侨生出境可能带来政治上的负面影响，除出境继承家业、会亲等请求给予批准以外，国家规定，暑假期间，沿海部分地区的学生“一般不批准出境”，且“鉴于往年有些华侨学生到港澳后，不能转往侨居国”，因此，除非确定能取得侨居国入境证明者，原则上一般不批准华侨学生出境^④。严格的出境管理造成了侨生的不满与国内外华侨的不安，当此后管理松懈之时，出境的人数必

^①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归国华侨学生、港澳学生团结教育工作的报告（二稿）》，1962年4月，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215-1-294-052-057。

^② 《关于国内双重国籍的几点说明》，1961年，安溪档案馆，档案号：0048-002-0060-0041。

^③ 《关于侨生工作的调查报告》，1962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017-0048-0052。

^④ 《关于华侨和港澳学生回家渡假的审批原则请示报告》，1962年7月3日，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215-1-151-016-017。

然迅速增加。

总而言之，虽然对于归侨和侨生回国的态度有些变化，但是，鉴于海外高校华侨教育的缺失，中国有担负侨生教育的责任，因此对于欲回国就读高校的侨生，国家一直都持欢迎态度；而对于中小学侨生，中国则逐渐由不加以区分地欢迎，转向劝勉侨生尽量在侨居地完成中学课程，再回国就读大学。一方面是争取侨生的努力；另一方面是国内学生人数的剧增，学校的不敷需要，且为处理好与他国的外交关系，国家渐趋于鼓励侨生尽量在侨居地完成高中学业。

二 华侨补习学校的设立

根据学业水平不同，归国侨生被分配至相应的各级学校继续学习。东南沿海重点侨乡的大多数中小学校每年皆负有接收安置一定数额侨生的任务。

与普通归侨相比，侨生具有年龄小，以归国求学为目的的特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回国的侨生，知识与综合能力参差不齐，且普遍汉语水平较差，年龄偏大；侨居地所学课程与国内存在差异，归国后难以适应新课程，以致考试成绩不佳，未能顺利升学，这给人留下侨生知识水平不高的观感。考虑到部分侨生或文化程度较低，或因语言障碍而暂时无法顺利升学，或归国未赶上考期，国家为给予适当照顾，华侨补习学校这一特殊历史产物便应运而生。

侨生大批回国，原有中学难以容纳。为了解决侨生升学问题，北京、广州、厦门三地的华侨补习学校相继成立。此后，昆明、桂林、汕头、海南等重点侨乡也创办了华侨补习学校。同时，福建省侨委还积极鼓励华侨创办学校或补习学校（班），以分散的、小型的为主，利用当地的房屋和师资力量，采取“以生养校”的办法和争取华侨对办学的支持来解决经费，尽可能满足侨生的升学需求，“减少一些不必要出去的青少年出国”^①。1955年，晋江市召开了华侨子女补习学校会议。报告显示，当时晋江市已在各县建立了一些不对外公开招生的华侨子女补习学校，专为升学考试落榜的侨生提供补习场所，且不限制入学年龄，超龄学生参加补习后仍能继续升学^②。许多公办与私立的归国华侨补习学校的创办，是保障更多侨生顺利升学的重要举措。华侨补习学校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帮助侨生补

^① 《关于归国侨生教育工作的联合报告》，1962年3月24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33-001-0644-0088。

^② 《召开华侨子女补习学校会议报告》，1955年6月18日，安溪县档案馆，档案号：0048-002-0012-0061。

习,使之将国外所学与国内课程衔接,也分流了大量的归国侨生,暂时缓解中等学校和大学的接收压力。

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即是最早创办的华侨补习学校之一,由陈嘉庚倡办。陈嘉庚鉴于东南亚华侨教育受阻的情况,担忧海外华侨子弟与广大华侨一样,“心随境变,乐不思蜀”,因而积极鼓励侨生回国读书。同时,另设补习班,帮助考试未及格者。集美补校于1954年开始正式招生,担负着接待安置、补习教育、政治审查、分送入学等四项任务^①。这类华侨补习学校区别于普通中学,也区别于侨办学校,专为协助侨生升学而准备。

集美华侨补习学校设有初、高中各年级补习班及初、高中预备班和大学先修班(约分别相当于今小学六年级、初三、高三),安排不同年龄、知识层次的侨生入班短期学习;从回国时起至7月,侨生可参加国家统考,按成绩高低到各级学校升学^②。集美侨校还设有“理工、医农、文科三大类大学先修班,后来又增设华大预科班、高一、二、三若干正规班和文化补习就业班。学校发展规模2300人,人员定编252人。”^③1962年时,该校的大学先修班和高三原有学生数491人^④,全校接收侨生1900人^⑤。

这一时期,侨生回国数量众多。考虑到多数侨生出身工商业或职员家庭,政府强调侨生的学习、生活费用,应该由家庭汇款解决,这也是争取侨汇的一个途径。据调查,福建农学院全院侨生212人,“家庭经济状况大部分是良好的”。在海外从事工商业有较大财力的占78%,侨民小商贩占22%,无力汇款的只占侨生总数的8.2%,其中多数是1957年及1958年回国的^⑥。“以生养校”是华侨补习学校采取的解决经费困难的办法。

华侨补习学校暂时容纳了大批回国侨生,但它毕竟不是正规学校,而是以专门补习功课,短期内(一般为一年,必要时可延长至两年)协助侨生提高文化、政治知识水平,以便其参加升学考试为目的。华侨学生在补校不能升级补习,一般只能留原级补习,编级考试时,如果程度太差,还要降级补习^⑦。

华侨补习学校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因循建国后侨生大量归国与其后海外

① 《集美文史资料》(第十辑),内部发行,第3-6页。

② 笔者对厦门市泰国归侨联谊会会长叶波通先生的访谈记录,时间:2013年10月15日。

③ 《集美文史资料》(第十辑),内部发行,第6-7页。

④ 《各地侨生工作情况报告》,1962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017-0048-0072。

⑤ 《关于侨生工作的调查报告》,1962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017-0048-0052。

⑥ 《福建农学院侨生工作总结》,1960年4月9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218-001-0116-0027。

⑦ 《关于华侨学生询问回国升学若干问题的答复》,1955年,安溪档案馆,档案号:0048-002-0012-0021。

排华产生的大批侨生回国升学而生,但随着这一历史时期的消逝,国内外局势发生变化与侨生数量减少,各地普通中学附设的补习班足以容纳零星陆续回国的侨生之时,特为大量侨生升学而设的华侨补习学校的使命也宣告终结。60年代后期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侨生开始受到冲击,侨生与国内其他学生都被要求上山下乡,此后侨生归国陷入了低潮。而华侨学校或因为师资、财政等方面的问题,或因为从私立向公立发展的办学方针而停办或改制、转型。总体来看,华侨补习学校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式微,“文革”时受到重创,集美补校“广大师生上山下乡,1971年被迫停办,校产被分光,校舍被占用”。文革结束后,1978年,国务院决定复办集美侨校。复办初期,困难重重,一无校舍,二无设备,三无教师,四无学生,百废待兴^①。其后又经历一系列的变化,集美补校演变成今天的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其他华侨补习学校也相继经历了“文革”期间停办,70年代末复办及转型,进入新时期转而从事华文教育的过程。

三 “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

中共中央于1957年提出“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意在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在共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对归侨侨眷适当照顾^②。侨生同属归侨群体,自然也成为这一原则的实施对象。

“一视同仁,适当照顾”是将侨生与国内学生同等对待,但因侨生长期居住海外的特点,以及其经济与政治意义,又对之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在就学上,侨生升学可享受“同等成绩,优先录取”的优待,但不予以免试录取或降低分数录取。此外,鉴于侨生的年龄偏大,因此投考普通高中的侨生年龄,按国内规定的年龄标准放宽了一、二岁^③。侨务部门要求“在安排侨生计划时,应充分考虑侨区侨乡的特点,侨区教育事业的指标不宜压缩得过低,侨乡的学校应适当多录取一些侨生及依靠侨汇读书的侨属子弟,侨办学校在招生时更应该比较多地录取华侨子女。”1961年,福建省高中毕业程度的侨生有1300多人,福建省教育厅和侨委会要求贯彻“同等成绩,优先录取”,适当照顾侨生、侨属生的入学比

^① 《集美文史资料》(第十辑),内部发行,第7-8页。

^② 上官小红 《归侨与侨乡社会:福建安溪归侨安置研究(1949—1960)》,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5月。

^③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1958年,安溪档案馆,档案号:0048-001-0021-0036。

例，省内各大学招收新生时，侨生的比例应该不低于 10%^①。尽量录取侨生入学，一方面是为争取侨汇，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政治方面。侨生回国达到求学目的，即可避免其申请出国，在政治上争取侨生的目的便已达到。但因学校招生名额有限，“同等成绩，优先录取”仍不可能满足所有侨生的升学要求。1961 年，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中录取了“约有侨生高中毕业生一千一百人的半数左右”^②。1962 年，集美华侨补习学校的大学先修班和高三原有侨生数 491 人，报考 414 人，顺利录取仅为 35 人^③。因此，即使放宽录取标准，每年仍有大量侨生投考失利。

对于落第侨生，国家无力包下来让他们逐级升学，而是贯彻另一种“包下来”的精神，对他们抓紧思想教育，稳定情绪，安排部分侨生回原校或到补习学校补习；同时“下马”大专和中专，即安排华侨学生就读大专和中专，少数不愿继续学习的，则安排他们就业^④。家境好的侨生家庭往往要求入读高中和四年制、五年制的大学，不愿去读中等专业学校和学程较短的专业学校和训练班^⑤；但安置的方向主要还是面向劳动生产，因而国家要求考不上学校的侨生要有参加劳动生产的思想准备^⑥。实际上，多数落第的侨属生的升学就业问题无法解决。如 1962 年华侨集美学校落榜侨生中，安排留校补习的有 254 名，其余的或投亲，或少数被安置往国营华侨农场和其他去处，尚有 52 名侨生难以安置^⑦。因侨生回国目的是升学，所以安排其从事农业劳动往往引起他们的抵触与排斥，国家可提供的岗位和个人意愿也难以协调。

对侨生的“适当照顾”还体现在生活上的关注。侨生长于异域，侨居地的生活习惯、生存环境与中国差异甚大，归国后常难以适应。福建省侨委经过一番调查，发现侨生在学校生活遇到诸多困难，食堂伙食差，副食品供应、学校的物资设备和侨生日常生活、学习用品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因此，省侨委要求学校办好食堂，建议商业部门改善对侨生的副食品供应，建议各有关部门积极设法帮助

① 《关于归国侨生教育工作的联合报告》，1962 年 3 月 24 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33 - 001 - 0644 - 0088。

② 《发“努力做好侨生、侨属工作”的发言提纲》，1962 年 1 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 - 017 - 0037 - 0001。

③ 《各地侨生工作情况报告》，1962 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 - 017 - 0048 - 0072。

④ 《关于归国侨生教育工作的联合报告》，1962 年 3 月 24 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33 - 001 - 0644 - 0088。

⑤ 《发“努力做好侨生、侨属工作”的发言提纲》，1962 年 1 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 - 017 - 0037 - 0001。

⑥ 《传达贯彻归国侨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1958 年 4 月 19 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 - 013 - 0016 - 0013。

⑦ 《各地侨生工作情况报告》，1962 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 - 017 - 0048 - 0072。

解决侨校所必需的物资设备及侨生所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①。补习学校还为经济困难的侨生提供助学金。集美华侨补习学校的助学金分为三等，每月分别为13元、11元、9元^②。对申请助学金的经济困难者，评议给予优先照顾。除为侨生入学、经济等提供各种便利之外，侨校还开展文娱活动，在元旦、春节时，组织节日联欢，使侨生能尽快融入新环境。

在“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之下，宣传与思想教育从未被忽视，宣传教育与适当照顾同步并行。通过对侨生的政治工作，学校经常对侨生进行劳动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以期不断提高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觉悟。侨务部门有组织地安排学生经常写信与海外亲属联络。家信贯彻报喜的原则，联合运用侨报、侨乡报、乡刊、乡讯等宣传工具传达中国新面貌，保持华侨与中国的联系，并争取侨汇。同时，政府和学校时刻关注侨生的思想动态，诸如总结学校里的侨生“情况一般较好，政治上求进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不断提高，约有10%—15%的侨生已入团，有少数已入党”，“学习一般也较努力，其中少数是优秀生，生活作风也在逐步变化，大多数都参加学校劳动，一般能认识国家困难，对当前较为艰苦的生活条件很少有怨言”^③。又如评价福建农学院全院侨生212人，“思想进步，表现积极的有66人，占31.1%，表现一般的有123人，占58%，回国后对生活劳动还没有习惯，对党的政策方针认识比较模糊的有23人，占10.9%。”^④ 这些数据与判断究竟是否准确，思想表现的好坏难以界定，有些也许是根据情境需要而主观判断的结果。

一份档案文件记载了集美中学高三第十班的5个侨生（吴、庄、贺、邱、王）的日常谈论内容，涉及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政治生活和其他一些重大问题^⑤。从谈话中可见，他们对与国外迥异的中国现状表示不满。中国囿于现实环境无法满足侨生预期的生活；且侨生来自海外，对中国情况不熟悉，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隔阂尤深，为此政府采取加紧思想教育的对策。有关政府部门认为“在国内学生思想认识上已经解决或基本上解决的问题，对归国华侨学生来说完全是新的问题”，因此强调，密切结合侨生的思想特点，采用各种适当

① 《关于侨生工作的调查报告》，1962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017-0048-0052。

② 笔者对厦门市泰国归侨联谊会会长叶波通先生的访谈记录，时间：2013年10月15日。

③ 《发“努力做好侨生、侨属工作”的发言提纲》，1962年1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017-0037-0001。

④ 《福建农学院侨生工作总结》，1960年4月9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218-001-0116-0027。

⑤ 《关于加强侨生当前的思想教育妥善安排寒暑生活的意见》，1962年12月20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024-0349-0088。

的方式，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补课”，使他们与国内学生共同进步^①。此外，归国华侨学生补习教育是国内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方针，侨生毫不例外地被希望培养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鉴于社会普遍认为侨生大多出身中上层，生活优裕，缺乏劳动习惯，侨务部门要求补习学校要着重对他们进行劳动、爱国主义教育，使其树立劳动观念，增强爱国主义思想。

认真考察“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会发现这一原则最终意在使侨生及其他归侨适应国内的具体情况。“适当照顾”只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临时举措，照顾不是为了特殊化^②。“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与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弱化侨生的特殊性，使之认可并适应于中国社会。

四 侨生安置工作的不足与困难

如上所述，侨生安置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有些情况殊难令人满意，安置工作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困难。

（一）侨生安置工作的不足

地方上侨务工作人员的紧缺和侨务政策的缺失使侨务工作开展受挫，难以应对侨生安置的各种问题；且侨务部门与相关学校对侨生及侨生在国外生活情况了解有限^③；对一些有技术专长的侨生，各地未能据其专长分配合适岗位，致使他们所用非所学；对回国后人地生疏，确有困难的侨生，政府也未能加以有效帮助。广东省侨务部门于1962年的总结中认为，各校的指导帮助、检查监督不够，缺乏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其次，在一些学校中，未能全面贯彻当时的侨务政策，强调“一视同仁”而忽视“适当照顾”，“对华侨学生和港澳学生的缺点看得较多，优点看得较少，要求偏高偏急，工作方法简单粗糙”。侨务工作上的偏颇和政策上的变幻无常，使得“有些华侨学生不要或不敢要侨汇，有些侨汇证不敢享受优待，国外寄回副食品不敢公开吃，带回国内的衣服也不敢穿；有心里

^① 《归国华侨学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1958年，安溪档案馆，档案号：0048-001-0021-0036。

^② 《传达贯彻归国侨生教育工作方针政策若干问题》，1958年4月19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013-0016-0013。

^③ 《关于归国华侨职工安置工作的情况和意见》，1956年，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048-002-0014-0030。

话也不敢讲”，有少数单位甚至认为华侨学生海外关系复杂，不好培养而拒绝录取^①。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影响了侨生升学安置工作，也影响了整体侨务工作的开展。

侨生安置工作是中国侨务工作的重要部分，也是统战工作的内容。中央文件中常见批评地方侨务部门对中央有关指示学习领会不够的内容，尤其是地方侨务工作者对华侨情况了解不够，“不能充分认识到做好侨生和侨属生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特别是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政治意义和它的经济意义”，表现在工作上的一般化，甚至官僚主义作风，没能很好地从华侨学生特点出发，措施上“不够具体、落实和有力”。对于新中国来说，安置侨生的政治意义更是大于经济意义。在政策界限上，有些学校对侨生海外关系、接受侨汇等问题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反映在建团、建党、毕业鉴定、政治审查、招收新生等工作上，都有不符合中央政策精神的情况^②。

（二）侨生安置工作的难度

侨生的自身特点加大了侨生安置工作的难度。

首先，归国侨生往往年龄偏大，升学安置难度大。国家规定，报考初中的国内学生，不得超过17岁（应届毕业生除外）。然而，归国侨生中，超过这一年龄标准的侨生不在少数。因此，中侨委规定将年龄放宽，初一超龄为20岁，以此类推，但不予以免试录取或降低分数录取。不过，在此规定下，超龄的侨生仍甚多。据1964年1月调查，福建省集美华侨补习学校超龄超期学生共有261人，“其中有68.2%集中在先修班和几个补习班”^③。在安置中，侨务部门往往左右为难，不得其法。

其次，侨务部门希望将超龄侨生安置到农场或企业等相关部门工作，但侨生归国目的是求学，因而抵触劳动，不安于居。正如被安置于农村的归侨一样，被安置于县城或城镇中学的侨生也常有不满情绪。这些侨生“绝大多数是单身归国，国外家庭及其本人中心思想是为了求学，因此就学迫切，本身一贯少参加劳动，缺乏习惯，缺乏劳动观点。一旦不能达到目的，打击必定很大，对动员参加劳动思想抵触很厉害”^④。有些侨生虽分得土地，却不懂得耕种，而在号召以劳

^① 《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归国华侨学生、港澳学生团结教育工作的报告（二稿）》，1962年4月，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215-1-294-052-057。

^② 《发“努力做好侨生、侨属工作”的发言提纲》，1962年1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017-0037-0001。

^③ 《关于安置侨生的通知》，1964年4月6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48-003-3102-0049。

^④ 《安置侨生侨青就学问题的专题报告》，1954年8月13日，安溪县档案馆，档案号：0048-001-003-0066。

动为荣的中国是无法容忍的。针对此类情况，政府往往采取反复教育的方式，以期从思想上根本改变侨生的想法，让他们积极参加劳动，将学习与劳动相结合。国家规定，“归国华侨学生的升学和就业，必须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经分配后到处流动的，只能说服回原校学习”^①。这种政策和教育方法，实际上能取得多大的效果，是值得探讨的，侨生对于未能称心如意的分配和对劳动教育的抵触之心，是显而易见的。侨生对中国社会存在不适应或不满情绪，都会对侨务工作安排产生抵制。

而有些年龄偏大的侨生，则迫切要求就业。多数同学要求在城市的工厂和其他行业工作。身居国外的家长也关注侨生回国能否升学和就学，且家境好的侨生家庭希望读高中和四年制、五年制的大学，不愿读中等专业学校和学习时间较短的专业学校和训练班；希望读工科、医科、农科等大学，不愿读师范；大学毕业后工作希望安排在南方、福建或城市，不愿到西北、西南和农村。大多数侨生如果不能达到就学目的就要求出国升学，极少数侨生准备考不上学校就选择就业，但就业只愿意从事工业和商业，拒绝从事农业^②。

按政策规定，包括侨生在内的归侨有优先被安排在城市就业的待遇，但囿于城市工作岗位有限，落第侨生的升学就业问题无法解决，不少侨生与家长认为在国内没有前途，要求出国。厦门市1961年已出国的侨生和侨属生有300多人，晋江石狮公社1960年9月上旬申请出国的有80人，学生占55%，晋江南侨中学一个月中要求出国的有79人^③。而申请出国被认为具有政治上的重大影响。

此外，侨生安置办法不够全面细致与稳定，未能密切联络海外华侨社会，也使侨生的积极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余 论

侨生回国升学现象是伴随着华侨社会的形成及其与中国社会的紧密联系而产生的，海外华侨倾向于将子女送回中国接受教育，而特殊时期的华侨归国潮加大了侨生回国的数量。中国对侨生的积极态度不仅意在争取侨汇的经济意义，更在

^① 《当前工作问题（初稿） 何香凝主任在华侨事务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谈的报告》，1958年，安溪县档案馆，档案号：0048-002-0041-0054。

^② 《发“努力做好侨生、侨属工作”的发言提纲》，1962年1月，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78-017-0037-0001。

^③ 《关于归国侨生教育工作的联合报告》，1962年3月24日，福建省档案馆，档案号：0133-001-0644-0088。

于广泛争取华侨对新政权支持的政治意义。侨生回国不仅有利于传达中国的新形象，更是新政权获得海外华侨社会认可的表现。而大量侨生回国又催生了华侨补习学校这一特殊历史产物。侨生对中国知之甚少，“只是抱着一股热情，认为祖国就是可爱毫无缺陷的”^①，但中国的现实与其想象相出入带来的心理落差逐渐抵消了新中国带来的民族自豪感，面临的经济困难和国籍选择也让侨生望而却步。当侨生回国潮最终归于沉寂，华侨补习学校也随之转型，国籍变迁与认同的转化使得侨生的途经升学逐渐由华侨教育转向华文教育。而“一视同仁，适当照顾”原则既兼顾侨生的特殊性，又平衡着两个极端，以同化异，使其不因特殊而孤立。这一原则是推动侨生融入中国社会的加速器，但并未保障侨生免受“海外关系”带来的冲击。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这一原则修正为“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许多归国侨生也选择前往香港与海外其他地方，而中国大陆并未与这些侨生保持足够的密切联系，这与台湾积极联络侨生校友的举措形成鲜明对比。

【责任编辑：石沧金】

^① 《广东华侨中学综合报告》，1957 年 1 月 17 日，广东省档案馆，档案号：215 - 1 - 264 - 070 - 078。

region faced serious threat of terrorism, and a great challenge to counter-terrorism effort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 In this study, it discussed the necessary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discussion on the main form of communication and expansion of IS in Southeast Asia, the impact as well as response efforts i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Keywords】 Southeast Asia; Islamic State; Spillover Effects; Terrorism; Pan-Islamism

【Author】 WANG Yujuan, Lecturer, School of History and Administr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FANG Tianjian, PhD. Candidates, Southwest Nationalities Research Academy,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China

Resettlement of Returned Students in 1950s-1960s

SHANGGUAN Xiaohong

【Abstract】 Returned students were links to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hey were an important group for the United Front work.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a large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returned to China which also made efforts in the support of them and organized resettlement work. Overseas Chinese preparatory schools were the result of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 The resettlement based on equally also appropriate consideration principle and followed closely by socialist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at was not to intensify specialization, on the contrary, they aimed at weakening particularity of the students, and achieved student's adaptation, recognition and assimilation finally. There were some disadvantages of resettlement work, also characteristics of returned students and the practical dilemma made it difficult.

【Keywords】 Returned Students; Resettlement of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Overseas Chinese Preparatory Schools

【Author】 SHANGGUAN Xiaohong, PhD. Candidate, Research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China